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6.007

共同富裕视角下和谐消费及其经济增长空间效应

生延超¹, 徐珊¹, 李倩²

(1. 湖南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2. 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 从共同富裕视角深入剖析和谐消费的理论内涵, 发现和谐消费包含消费力和谐、消费关系和谐以及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有机统一, 其中, 消费力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分别反映了共同富裕的效率与公平思想。为进一步明确中国和谐消费的发展状况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和谐消费的理论内涵, 探索性地构建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指标体系,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 2007—2020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和谐消费水平, 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和谐消费的经济增长空间效应。实证结果表明: (1) 从时间趋势来看, 2007—2020 年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 但整体而言, 中国消费和谐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空间分布来看, 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异格局。(2) 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且在剔除异常值、增加控制变量与更换空间权重矩阵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3) 进一步检验发现, 和谐消费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牵引高质量供给, 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供需联动机制。据此, 建议以居民收入提高与社会保障完善为主线, 促进消费力和谐; 以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与社会信用体制健全为抓手, 改善消费关系; 协同推进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 以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和谐消费; 共同富裕; 经济增长; 空间误差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6.1; F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6-0042-13

引用格式: 生延超, 徐珊, 李倩. 共同富裕视角下和谐消费及其经济增长空间效应[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6): 42-54.

Harmonious Consumption and Its Spatial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SHENG Yanchao¹, XU Shan¹, LI Qian²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 Geography,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wealth, this paper finds that harmonious consumption includes the harmony of consumption power, the harmony of consumption relations, and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two, in which the harmony of consumption power and

收稿日期: 2023-08-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谐消费的理论及实证研究”(20FJYB048);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字经济促进湖南经济韧性的长效机制研究”(22YBA162)

作者简介: 生延超(1978—), 男, 河南南阳人, 湖南工商大学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旅游经济。

the harmony of consumption relations respectively reflect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harmonious consumption and its economic growth effe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consumption, this paper exploratively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of harmonious consumption power and harmonious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measures with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harmonious consumption level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and with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spatial effect of harmonious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trend, China's harmonious consumption level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from 2007 to 2020, but on the whole, China's consumption harmony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China's harmonious consumption level presents an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 which is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high in the coastal areas and low in the inland". Second harmonious consum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eliminating outliers, increasing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placing spatial weight matrix. Third, further tests show that harmonious consumption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supply by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us form a supply-demand linkage mechanism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sumption power harmony should be promoted by increasing residents' income and perfecting social security, the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should be improved by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demand-side management and supply-side reform should be synergistically promoted to facilita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high level of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Keywords: harmonious consumption; common prosperity; economic growth; spatial error model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要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毋庸置疑,共同富裕需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但与生产具有同一性的消费也应受到足够重视。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表现为生产水平的提高,更直接表现为由于消费能力提高而引致的人民生活的富足。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确提出,要在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推动共同富裕^[1]。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求政治文化和谐,还要求国民经济和谐。消费是最终需求,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中更是明确指出,“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要持续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和谐以消费和谐为必要前提,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以和谐消费为基础经济支撑。换言之,消费和谐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并且,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那么,和谐消费是否能够肩负起“联动供需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战略使命?为科学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基于共同富裕视角厘清和谐消费的理论内涵,明确中国和谐消费的发展现状与典型特征,厘清和谐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空间效应,这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强化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和谐消费”是伴随和谐社会应运而生的理论命题,属于消费经济学的新范畴。梳理和谐消费相关研究成果发现,目前消费经济学界对和谐消费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学者们普遍认为和谐消费理论是一种面向科学发展观的消费理论,为促进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应树立和谐消费观^[2-3]。但就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对和谐消费的研究仍集中于和谐消费理论内涵的探讨,且尚未达成共识。关于和谐消费的内涵,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一

是以文启湘教授为代表的“消费系统和谐论”^[2],认为和谐消费是指消费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如消费要素、消费结构、消费组织、消费理念等,与其他外部环境都处于和谐运转状态;二是以汤跃跃为代表的“三性和谐论”^[4],认为和谐消费是指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讲究理性,消费客体的经营活动讲究诚信,消费环境的自然和社会氛围讲究品性;三是以马伯钧为代表的“高质量消费论”^[5],认为和谐消费就是合理的高质量消费;四是以李松龄教授为代表,认为和谐消费是指消费力与消费关系的和谐^[6-8]。上述观点中,“消费系统和谐论”虽然从消费的内外系统对和谐消费进行了释义,但对消费的本质探讨还不够深入;“三性和谐论”虽然涉及了消费者内部的和谐、消费者和自然环境的和谐,但没有涉及消费者和关联者之间的和谐;“高质量和谐论”指出了消费和谐要求不断提高消费质量,具有一定前瞻性,但没有考虑消费差距的问题;李松龄教授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从消费力与消费关系两个方面对和谐消费进行释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谐消费的本质。考虑到消费和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继承并发展李松龄教授的和谐消费思想,将消费力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的辩证关系纳入和谐消费的范畴,从共同富裕视角进一步厘清和谐消费的理论内涵。

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对和谐消费理论的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和谐消费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虽然指出中国消费领域存在不和谐因素,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和谐消费水平,但由于缺乏有效测度中国区域消费和谐程度的定量研究,无法直观展现中国消费的和谐程度高低以及中国和谐消费的典型特征。鉴于此,本文探索性地构建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耦合协调的角度,测算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和谐消费水平。另外,虽然“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这一观点已形成共识,但和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与空间效应仍未受到足够重视。因此,本文在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和谐消费经济增长空间效应,探究和谐消费是否能够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进一步明

确和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期在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和谐消费

(一)和谐消费的理论内涵

共同富裕理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李实^[9]指出,共同富裕应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理解,其中,“富裕”反映效率,“共享”代表公平。那么,共同富裕理念折射在和谐消费上即要求消费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李松龄^[8]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法,一分为二地看待消费,认为消费包含消费力与消费关系两个方面,进而认为和谐消费就是消费力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该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谐消费的本质内涵,也契合共同富裕背景下新时代对消费的内在要求。其中,消费力和谐反映了和谐消费对效率的高要求,它旨在通过对消费对象(物质消费资料与劳务消费资料)进行有效配置以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消费关系和谐则反映了和谐消费的公平性,它要求在消费过程中缩小消费差距,减少消费外在性,处理好消费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关联者的关系。共同富裕要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共同富裕理念下的和谐消费则应实现消费力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的有机统一。因此,本文继承并发展李松龄教授关于和谐消费的内涵释义,将和谐消费进一步界定为:在消费过程中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均是和谐的,包含消费力和谐、消费关系和谐以及二者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共同富裕既要家家“仓廩实衣食足”,又要人人“知文明懂荣辱”,并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10],这意味着共同富裕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等内涵^[11],涵盖了人与物、人与精神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和谐消费也具有经济特性、社会特性与生态特性等多重属性^[12]。和谐消费的经济特性表现在和谐消费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导向作用上。消费结构是要素变动影响产业结构的关键路径,由要素优化或扭曲引起的消费升级或降级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否的核心内容^[13-14],因而和谐消费引致的消费升级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与合理化转变。和谐消费的社会特性表现在消费和谐有助于培育社会全体成员注重本我、发展自

我的科学消费理念, 使人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 极大地丰富精神世界,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谐消费的生态特性表现在和谐消费有助于培育全体公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消费意识,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 和谐消费的测度方法

1. 耦合协调度模型

消费力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是消费和谐的两个基本方面; 消费力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的有机统一即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协调性, 是消费和谐的更高层次要求, 也是其直接表现形式。按照物理学耦合的含义, 消费和谐的过程就是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在相同的时间内、在一定空间中的耦合关联过程。由此,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15-16], 将消费力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彼此产生影响的程度定义为消费力-消费关系耦合度, 其大小反映了消费力与消费关系两者相互协调的程度, 也反映了消费的和谐程度。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耦合协调模型的构建步骤如下:

(1) 构建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 分别测算消费力和谐度与消费关系和谐度。

(2) 借鉴生延超等^[17]对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的定义, 测算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协调度。

$$cl = \frac{2\sqrt{F_1(x,t) \cdot F_2(y,t)}}{F_1(x,t) + F_2(y,t)}。$$

(3) 测算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耦合协调度, 即和谐消费水平。

$$D = \sqrt{cl \cdot T} ,$$

$$T = \alpha F_1(x,t) + \beta F_2(y,t) 。$$

以上各式中: D 为耦合协调度; cl 为协调度; T 为消费力与消费关系的综合评价指数, 反映两者的整体效益或水平; α 与 β 分别为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权重, 根据德尔菲法中 20 位专家的反馈结果, α 取 0.6, β 取 0.4。

2. 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指标体系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和谐消费水平, 首先需要测度消费力和谐度与消费关系和谐度。但考虑到无法直接测量消费力和谐度与消费关系和谐

度, 而消费力和谐、消费关系和谐的概念内涵与其影响因素是一个有机体^[7], 因此, 本文从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影响因素出发, 构建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德尔菲法, 采用 20 位专家匿名打分的方式, 最终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的影响因素众多, 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 但鉴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无法客观衡量, 本文着重从经济因素入手选取相应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消费环境对提升和谐消费力、促进消费和谐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 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最终表现为社会在一定时期所获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居民生活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不仅影响消费数量, 还影响消费结构; 居民消费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的, 消费环境在短期会影响消费者所获得的消费效用, 在长期则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因此, 将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及消费环境作为和谐消费力子系统的准则层, 并借鉴相关研究^[12,18], 选取各级准则层的具体测度指标。改善消费关系则需要在保障消费畅通、可控的条件下增加消费的公平性。只有物质消费资料、劳务提供者以及消费者的流动渠道畅通, 才能保证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者都能够公平地获取同等消费资料, 居民的消费需求才能尽可能得到满足, 消费关系才能和谐。根据生命周期假说, 只有外在条件可控, 消费者才会减少预防性储蓄, 增加当前消费, 使消费者效用趋向最大化。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只有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合理, 消费具有公平性, 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和谐。因此, 本文将消费的公平性、畅通性及可控性作为和谐消费关系子系统的准则层, 并借鉴相关研究^[19-20], 从收入分配合理与区域协调共享等方面选取表征消费公平性的指标, 从贸易情况与外部交易环境等方面选取表征消费畅通性的指标, 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降低不确定性的角度选取表征消费可控性的指标。

本研究建构的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三) 和谐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

作为符合共同富裕理念的一种高级消费状态,

表1 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准则层	具体测度指标	属性	权重
和谐消费力	经济发展 总体水平 (0.40)	GDP/亿元	+	0.10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	0.10
		一般预算支出/亿元	+	0.20
		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亿元	+	0.20
		城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亿元	+	0.20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亿元	+	0.20
	生活水平 (0.40)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	0.10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10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10
		居民消费水平/元	+	0.10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元	+	0.20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元	+	0.20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辆	+	0.05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部	+	0.05
		平均家庭户规模/(人·户 ⁻¹)	+	0.10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台	+	0.30
	消费环境 (0.20)	人均道路面积/m ²	+	0.3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 ²	+	0.20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个	+	0.20
和谐消费关系	公平性 (0.50)	城乡消费水平比	-	0.30
		农业与制造业工资比	-	0.30
		城乡居民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电冰箱)拥有量比	-	0.25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	0.15
	畅通性 (0.25)	净出口总额/亿美元	+	0.20
		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	0.20
		旅游创汇总额/亿美元	+	0.20
		三种专利授权数/件	+	0.20
		卫生机构数/个	+	0.20
	可控性 (0.25)	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万人	+	0.40
		每百万人中专及以上人数/人	+	0.30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人	+	0.30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和谐消费具有经济增长效应。具体来看,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来源于和谐消费的需求效应。凯恩斯学派认为,经济衰退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而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位于“三驾马车”之首。和谐消费是消费的一种高级形态,在和谐消费状态下,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与物的和谐体现为消费者对物质消费资料与劳务消费资料的有效配置,即消费者在收入水平一定、物质与劳务消费资料价格一定时,通过合理选择物质消费资料与劳务消费资料的购买组合以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2]。人与人的和谐体现在分配关系的和谐上,即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务的交换价格等于劳务的需求价格也等于劳务的供给价格,此时劳务消费者

不占有劳务提供者的任何剩余价值^[6]。这种人与物、人与人的和谐有利于通过最大化消费者效用与提高劳务提供者的生产积极性刺激消费需求增长。并且,在完善而均衡的市场这一必要制度安排下^[7],和谐消费所形成的消费需求是市场均衡状态下的有效需求,消费资料能够在市场中跨区域自由流动,因而和谐消费在通过发挥需求效应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和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在社会再生产的4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下一轮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对生产具有指引与导向作

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为产品生产创造了主体,没有消费,产品生产就没有意义,就如“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21]。和谐消费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消费,是质量齐升的消费。根据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论断,和谐消费在提高消费者消费能力的同时必将对企业生产提出更高的要求,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在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中推动经济增长。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 和谐消费牵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推

动经济增长的供需联动机制。

三、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和谐消费水平总体评价

(一) 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动态演进

根据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指标体系,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 2007—2020 年中国和谐消费力—和谐消费关系耦合度,即消费和谐度(见表 2)。参考相关研究^[17,22],本文定义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耦合协调度达到 0.80 为良好协调,0.70~0.79 为中级协调,0.60~0.69 为初级协调,低于 0.60 的为勉强协调。

由表 2 可知,2007—2020 年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均值由 0.6145 逐年增大至 0.6809,这说明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但整体来看,中国

表 2 2007—2020 年中国和谐消费水平

省份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20
北京	0.7011	0.7106	0.6982	0.6933	0.7086	0.7134	0.7292
天津	0.6092	0.6072	0.6333	0.6631	0.6581	0.6572	0.6536
河北	0.6457	0.6497	0.6903	0.7052	0.6935	0.6872	0.7050
山西	0.5445	0.5530	0.5891	0.6077	0.5956	0.5901	0.6262
内蒙古	0.6052	0.5898	0.6366	0.6626	0.6608	0.6629	0.6507
辽宁	0.6329	0.6401	0.6583	0.6680	0.6545	0.6410	0.6462
吉林	0.6001	0.5753	0.6049	0.6162	0.6109	0.5988	0.6378
黑龙江	0.6092	0.6332	0.6624	0.6716	0.6611	0.6613	0.6407
上海	0.7408	0.7302	0.7136	0.6959	0.6931	0.7056	0.7179
江苏	0.8023	0.7975	0.8213	0.8257	0.8245	0.8202	0.8326
浙江	0.7687	0.7680	0.7799	0.7839	0.7836	0.7654	0.7848
安徽	0.6002	0.6135	0.6474	0.6693	0.6673	0.6665	0.6886
福建	0.6137	0.6292	0.6559	0.6700	0.6754	0.6785	0.6925
江西	0.5725	0.5837	0.6215	0.6345	0.6350	0.6387	0.6635
山东	0.7518	0.7590	0.7722	0.7727	0.7730	0.7717	0.7803
河南	0.6479	0.6698	0.6895	0.7010	0.7003	0.7056	0.7294
湖北	0.6246	0.6323	0.6623	0.6819	0.6815	0.6768	0.6933
湖南	0.6199	0.6257	0.6555	0.6712	0.6785	0.6746	0.7108
广东	0.8001	0.7995	0.8210	0.8364	0.8487	0.8505	0.8633
广西	0.5530	0.5636	0.5937	0.6148	0.6215	0.6294	0.6516
海南	0.5670	0.5600	0.6072	0.5862	0.6149	0.6151	0.6062
重庆	0.5237	0.5376	0.5931	0.6111	0.6197	0.6189	0.6455
四川	0.6229	0.6539	0.6716	0.6976	0.6952	0.6993	0.7219
贵州	0.4716	0.4872	0.5195	0.5559	0.5773	0.5894	0.6289
云南	0.5378	0.5327	0.5686	0.5877	0.5973	0.6081	0.6413
陕西	0.5558	0.5781	0.6165	0.6339	0.6357	0.6311	0.6465
甘肃	0.4917	0.5063	0.5304	0.5597	0.5653	0.5712	0.5934
青海	0.5252	0.5335	0.5750	0.5838	0.5861	0.5883	0.6037
宁夏	0.5000	0.5197	0.5599	0.5788	0.5897	0.5903	0.6138
新疆	0.5958	0.5874	0.6241	0.6469	0.6489	0.6433	0.6284
均值	0.6145	0.6209	0.6491	0.6629	0.6652	0.6650	0.6809

注: 样本省份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西藏自治区; 同时, 限于篇幅, 仅列示 2007、2009、2011、2013、2015、2017 和 2020 年的测算结果。

消费力与消费关系仍处于初级协调状态,消费和谐度仍然相对较低。究其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均取得了大幅度攀升,但内需不足、居民消费力不高、消费关系不和谐仍是中国消费存在的现实问题,实现和谐消费还需要不断提高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公平、优化消费环境。

为科学反映中国和谐消费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采用相同等级划分标准,分别将2007年与2020年的消费和谐度分为4个等级,并借助ArcGis10.8对2007年与2020年中国和谐消费水平进行空间可视化展示(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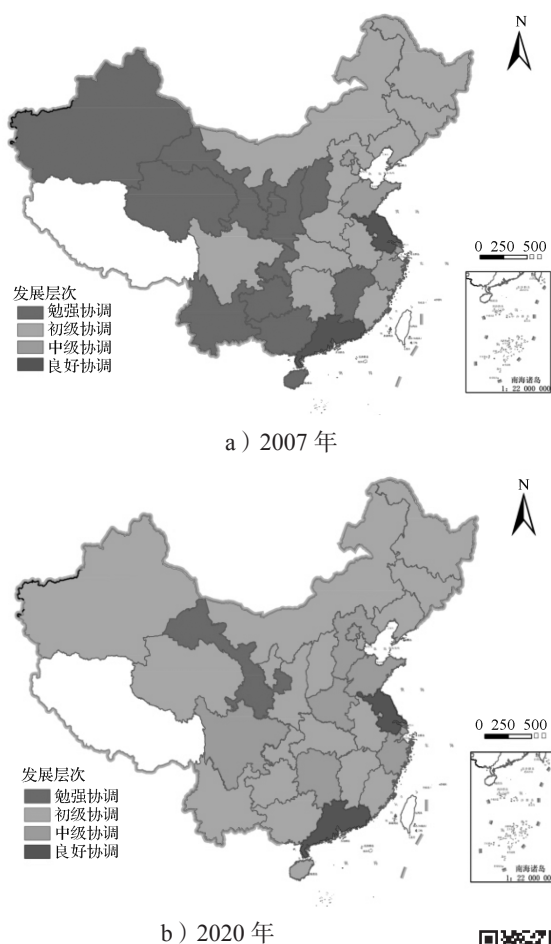


图1 2007年与2020年中国区域和谐消费时空演变

从时间趋势来看,研究期内中国和谐消费水平整体提高,消费向和谐迈进了一大步。如图1所示,2007年仅有上海、浙江、山东、北京4省(市)处于中级协调,但2020年处于中级协调的省(市)增加至8个。2007年,江西、广西、山西、陕西、新疆、云南、重庆、海南、甘肃、青海、宁夏、贵

州12省(市)均属于勉强协调层次,但至2020年,除了甘肃省外,其余11省(市)均实现了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此外,2007年各省份在不同耦合协调层次的分布相对均匀,但2020年仅有关东省仍处于勉强协调层次,广东、江苏处于良好协调层次,其余省(市)均处于初级或中级协调层次,这表明中国和谐消费的特征由“低水平大差距”向“高水平小差距”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期内虽然处于勉强协调层次的省份大幅度下降,初级协调与中级协调的省份增多,但处于良好协调层次的始终仅有广东与江苏2省,这说明中国消费和谐仍处于中低水平。推动消费力与消费关系由中级协调向良好协调转变是中国推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

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和谐消费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处于良好协调层次的广东与江苏均属于东部沿海省份,处于中级协调层次的上海、浙江、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均位于中国东部,相反,处于勉强协调层次的新疆、青海、甘肃等均位于中国内陆。另外,中国和谐消费具有以江苏和广州为中心的“高-高集聚”特征。2007年,处于中级协调层次的山东、上海与浙江均与江苏相邻;2020年,江苏周围的省(市)除安徽外均处于中级协调层次,广东周围的省份也均处于中级协调或初级协调层次。这说明中国和谐消费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间依赖性。

(二) 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典型特征

1. 经济依赖性

消费力在消费系统中处于决定性地位,而消费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收入水平,这决定了和谐消费呈现明显的经济依赖性。由表2与图1分析可知,消费力与消费关系处于良好协调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耀眼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究其原因,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广东省全年GDP总量依旧达11.74万亿元,占全国的10.9%,连续33年领跑全国;江苏省同样也是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位居前列的省份,自2009年起江苏省人均GDP连续稳居全国第一,为消费和谐的实现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2. 地理区位性

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呈现明显的地理区位性。在 4 个层次的省份中, 处于良好协调的广东省和江苏省分别位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在中级协调的区域中, 上海和浙江位于长江三角洲, 山东和北京位于环渤海湾区域。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区域均属于东部沿海地带, 交通便利, 市场经济活跃, 消费环境优良, 居民收入水平较高, 为消费力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并且, 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综合素质较高, 法规制度相对健全, 收入分配相对合理,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完善, 更易形成科学合理的消费关系。消费力的进一步提升, 为消费关系的改善奠定了物质基础, 而消费关系的提升和改善反过来又能推动消费力的提高, 二者相互作用, 最终促进更高水平的和谐消费。

3. 鲜明演进性

受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 中国和谐消费具有鲜明的演进性。中国区域经济率先发展起来的是珠三角地区, 然后在国家开放了 13 个沿海城市后, 区域经济发展逐渐由南向北演进。具体表现为, 长三角地区迅猛发展的同时, 国家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建设, 环渤海湾地区渐渐崛起。与之相适应的是, 消费力与消费关系耦合协调度也沿着先珠三角(广东)、再长三角(上海、浙江)、后环渤海湾(北京、山东、河北)这一路径逐渐向中级协调迈进。另外, 与“率先发展东部地区, 再实现中部崛起”这一区域经济增长阶段演进规律一致, 消费和谐也呈现“由东向中”演进的特征。在研究期内, 东部地区和谐消费水平较高, 中部地区紧跟其后, 河南与湖南等地更是一跃达到中级协调层次。但总体而言, 中部地区的消费和谐仍然是低层次的和谐, 尚需各级政府加强经济建设, 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进一步改善消费关系, 以消费和谐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共同富裕视角下和谐消费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指标选取、数据来源

1. 模型设定

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是空间计量模型的三种

基本形式, 其表达式分别如下。

空间滞后模型:

$$Y_{it} = \alpha + \rho WY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空间误差模型:

$$Y_{it} = \alpha + \beta X_{it} + \lambda W\mu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空间杜宾模型:

$$Y_{it} = \alpha + \rho WY_{it} + \theta WX_{it} + \beta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以上各式中: α 为截距项; Y_{it} 为被解释变量; X_{it} 为解释变量;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μ_i 为未被观测到的个体效应; δ_t 为未被观测到的时间效应; β 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代表邻地被解释变量对本地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λ 为空间误差项系数, 代表邻地误差项对本地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θ 代表邻地解释变量对本地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2. 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ln gdp$), 以人均 GDP 的对数衡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消费和谐度($hcons$), 以和谐消费力与和谐消费关系的耦合协调度衡量。

(3) 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重要解释变量造成估计偏误,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23-25], 从微观生产要素与宏观经济环境 2 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具体来说, 微观生产要素层面, 控制劳动要素投入($labor$)和资本要素投入($capital$)。其中, 劳动要素投入使用就业总人数衡量, 资本要素投入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衡量。宏观经济环境层面, 控制市场化程度($market$)、城镇化率($urban$)、信息化水平($information$)、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其中, 以市场化指数衡量市场化程度, 以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衡量城镇化率, 以邮电业务总量衡量信息化水平, 以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3. 数据来源

自 2007 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将“消费和谐”作为年度会议主题后, 和谐消费概念被广泛使用, 因此本文将研究区间定为 2007—2020 年。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 本文以 2007—2020 年中

国30个省份(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西藏自治区)为研究样本。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年鉴、EPS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指标数据的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弥补。需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测算和谐消费所需的城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水平4个指标的数据自2018年起不再公布,2018至2019年的数据采用前5年的平均增速进行推算。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消费支出有所下降,若以平均增速推算,其结果可能与真实数据有较大偏差,因此本文采用2015—2019年消费支出的均值替代2020年的消费支出数据。另外,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对所有非比值数据取对数。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二) 计量结果分析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对2007—2020年中国消费和谐度与人均GDP进行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gdp$	420	10.6273	0.5715	8.8414	12.0130
$hcons$	420	0.5540	0.0855	0.3555	0.8271
$\ln labor$	420	8.3891	0.8158	6.1181	10.9001
$\ln capital$	420	18.4355	0.9436	15.3996	20.1947
$\ln capital$	420	6.6896	1.0727	3.8772	9.9443
$urban$	420	0.5640	0.1342	0.2824	0.8960
$\ln finance$	420	9.7841	0.9993	6.9331	13.0777
$market$	420	6.6214	1.9959	2.3300	12.0000

知,和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全局Morans'I指数均大于0.2,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消费和谐度与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因此在研究和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需要将空间因素考虑在内。

2. 空间模型选择

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有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在探究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前,需要通过LM检验与LR检验,以选择适用于本研究的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LM检验与LR检验结果见表5。

表4 2007—2020年消费和谐度与经济增长全局Morans'I指数

年份	消费和谐度($hcons$)			经济增长($\ln gdp$)		
	Morans' I	Z	P-value	Morans' I	Z	P-value
2007	0.3998	3.5759	0.0003***	0.4932	4.3722	0.0000***
2008	0.3698	3.3248	0.0009***	0.4823	4.2685	0.0000***
2009	0.3548	3.1944	0.0014***	0.4566	4.0500	0.0001***
2010	0.3603	3.2543	0.0011***	0.4621	4.0824	0.0000***
2011	0.3433	3.1335	0.0017***	0.4500	3.9799	0.0001***
2012	0.3197	2.9412	0.0033***	0.4291	3.8031	0.0001***
2013	0.2635	2.4778	0.0132**	0.4104	3.6454	0.0003***
2014	0.2594	2.4581	0.0140**	0.3847	3.431	0.0006***
2015	0.2543	2.4241	0.0153**	0.3731	3.3358	0.0009***
2016	0.2665	2.5272	0.0115**	0.3843	3.4377	0.0006***
2017	0.2656	2.5239	0.0116**	0.4132	3.6849	0.0002***
2018	0.2877	2.6959	0.0070***	0.4055	3.6212	0.0003***
2019	0.3173	2.9356	0.0033***	0.3788	3.4228	0.0006***
2020	0.3162	2.9359	0.0033***	0.3889	3.5200	0.0004***

注:***、**分别表示在99%、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5 LM检验与LR检验结果

检 验	模型	统计量	P 值
LM 检验	Lagrange multiplier	0.440	0.507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0.591	0.442
	Lagrange multiplier	3.369	0.066*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3.520	0.061*
LR 检验	Likelihood-ratio test	0.000	1.000
		0.000	1.000

注:*表示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下同。

由表 5 分析可知, 在 LM 检验中, 消费和谐度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项不显著, 但空间误差项在 9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研究中国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应选择空间误差模型而非空间滞后模型。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进行 LR 检验以确保模型选择的合理性。LR 检验结果均显示接受“空间杜宾模型可以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 这意味着空间杜宾模型不适用于本文研究。综合 LM 检验与 LR 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实

证检验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 并将模型具体化为:

$$\ln gdp_{it} = \alpha + \beta hcons_{it} + \lambda control_{it} + \lambda W u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式中: $\ln gdp_{it}$ 为人均 GDP 的对数; $hcons_{it}$ 为消费和谐度; $control_{it}$ 为控制变量; W 为空间邻接矩阵。

3. SEM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Hausman 检验的统计量为 216.49, P 值为 0.00, 在 99% 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 6。

表 6 和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OLS		FE		SEM	
	(1)	(2)	(3)	(4)	(5)	(6)
<i>hcons</i>	5.3728*** (0.1943)	2.7110*** (0.1820)	2.8951** (1.3108)	1.0391 (0.7110)	1.4787*** (0.3156)	0.7360*** (0.2823)
<i>ln labor</i>		-0.1110*** (0.0234)		0.0241 (0.0559)		0.0288 (0.0414)
<i>ln capital</i>		0.1726*** (0.0168)		0.1230** (0.0538)		0.0999*** (0.0168)
<i>ln information</i>		-0.0471*** (0.0118)		0.0858 (0.0573)		0.0345 (0.0362)
<i>urban</i>		3.1375*** (0.1014)		1.0331* (0.5244)		1.0880*** (0.2400)
<i>ln finance</i>		-0.0056 (0.0249)		0.4659*** (0.1566)		0.4474*** (0.0494)
<i>market</i>		-0.0273*** (0.0061)		0.0130 (0.0207)		0.0080 (0.0084)
<i>constant</i>	7.6510*** (0.1089)	2.7110*** (0.1820)	8.5698*** (0.5940)	1.0391 (0.7110)		
λ					0.5811*** (0.0474)	0.3151*** (0.0771)
σ^2					0.0071*** (0.0005)	0.0047*** (0.0003)
<i>N</i>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i>R</i> ²	0.6465	0.9423	0.9380	0.9689	0.6465	0.6663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同。

表 6 对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双重固定效应模型 (FE) 及双重固定空间误差回归模型 (SEM) 的估计效度进行了比较。其中, 列 (1) (2) 为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 列 (3) (4) 为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列 (5) (6) 为使用双重固定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 列 (1) (3) (5) 为未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列 (2) (4) (6) 为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各模型的 R^2 发现, 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 这说明控制变量选取总体来说是合适的。从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来看, 3 个模型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和谐消费影响系数的大小在不同模型中存在差异, 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 1.0391 小于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中的回归系数 2.7110, 空间误差模型中的回归系数 0.7360 又小于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 1.0391, 这说明与空间误差模型相比, 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与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夸大了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估计偏误。

由列 (6) 可知, 在空间误差模型中, 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在 99%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 在和谐消费状态下, 消费资料得到有效配置, 消费者效应达到最大化, 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 劳动创造的经济价值也随之提升。控制变量中, 资本要素投入、城镇化率和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与钱海章等^[24]的研究结论一致; 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这是由于单纯依靠劳动要素投入已无法满足中国当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需要; 信息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变量选取的原因, 邮电业务总量无法全面衡量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是, 虽然中国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化, 但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其启示中国有必要推进统一的大市场建设。就空间效应而言, 空间误

差项的系数 λ 为0.3151,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中国和谐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谐消费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居民自身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水平的提高对邻地经济增长产生辐射作用。因此,在经济动力换挡的关键时期,需要进一步培育和谐消费理念的形,加快释放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价值,以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综上,和谐消费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假设1得以验证。

4.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和谐消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

剔除异常值、增加控制变量与更换空间权重矩阵3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对所有变量进行5%双边缩尾处理,缩尾后的回归结果见列(1);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对中国消费与经济增长均产生巨大冲击,剔除2020年样本后重新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见列(2);为避免遗漏变量偏误,将人口密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结果见列(3);列(4)与列(5)分别为将空间权重矩阵更换为反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后的实证结果。上述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和谐消费不仅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对邻地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剔除异常值		增加控制变量	更换空间权重矩阵	
	(1)	(2)	(3)	(4)	(5)
<i>hcons</i>	0.7970*** (0.2696)	0.9870*** (0.3101)	0.7165** (0.2823)	1.0334*** (0.2774)	1.0185*** (0.2734)
<i>ln labor</i>	0.1310*** (0.0341)	0.0837* (0.0448)	0.0275 (0.0409)	0.0241 (0.0421)	0.0254 (0.0423)
<i>ln capital</i>	0.0690*** (0.0152)	0.1338*** (0.0184)	0.0943*** (0.0166)	0.1227*** (0.0170)	0.1215*** (0.0168)
<i>ln information</i>	0.0157 (0.0222)	0.0240 (0.0395)	0.0382 (0.0355)	0.0851** (0.0349)	0.0832** (0.0345)
<i>urban</i>	2.7333*** (0.1978)	1.2423*** (0.2627)	1.0184*** (0.2393)	1.0342*** (0.2373)	1.0741*** (0.2554)
<i>ln finance</i>	-0.0975*** (0.0287)	0.0399** (0.0200)	0.4199*** (0.0495)	0.4658*** (0.0511)	0.4623*** (0.0518)
<i>market</i>	0.0118 (0.0085)	-0.0010 (0.0091)	0.0104 (0.0084)	0.0130 (0.0081)	0.0129 (0.0081)
<i>ln population</i>			-0.0001*** (0.0000)		
λ	0.5465*** (0.0514)	0.3320*** (0.0790)	0.3481*** (0.0752)	0.0171* (0.0095)	0.0416* (0.0219)
σ^2	0.0042*** (0.0003)	0.0055*** (0.0004)	0.0045*** (0.0003)	0.0049*** (0.0003)	0.0049*** (0.0003)
<i>N</i>	420	390	420	420	420
R^2	0.8443	0.7227	0.6422	0.6123	0.6166

5. 机制检验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下一轮社会再产生的起点,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导向与指引作用。那么,和谐消费在发挥微观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以消费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形成,协同推动经济增长?换言之,供给优化是否为和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为厘清这一问题,本文从供给优化视角进一步检验和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鉴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任务,供给优化效应突出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本文在空间误差模型中引入和谐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项,探究和谐消费能否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供需联动机制。机制检验模型如下:

$$\ln pgdp_{it} = \alpha + \beta hcons_{it} \times industry_{it} + \gamma control_{it} + \lambda Wu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式中: $hcons_{it} \times industry_{it}$ 为和谐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项,其中,产业结构包含产业结构整体升级(*industry1*)、产业结构高级化(*industry2*)、产业结构合理化(*industry3*)。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借鉴相关研究^[26-27],采用结构层次法从三次产业比例角度近似表征;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28];产业结构合理化采用泰尔指数的倒数衡量^[25]。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和谐消费与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0.3982,和谐消费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0.6575,二者均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和谐消费的供给优化效应反映在推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上。究其原因,

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和谐消费对消费资料配置、消费者效用、消费环境等的高要求, 必将不断推动产业质量提升, 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智能化迈进。换言之, 和谐消费能通过加快消费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形成供需匹配效应,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谐消费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 1.4674,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是, 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明显的“服务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无法与和谐消费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合力。

综上, 和谐消费通过牵引产业结构升级, 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供需联动效应, 假设 2 得以验证。

表 8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1) ln gdp	(2) ln gdp	(3) ln gdp
<i>hcons</i> × <i>industry</i> 1	0.3982*** (0.1072)		
<i>hcons</i> × <i>industry</i> 2		0.6575*** (0.1274)	
<i>hcons</i> × <i>industry</i> 3			1.4674 (1.2216)
ln <i>labor</i>	0.0732** (0.0344)	0.0769** (0.0338)	0.1391*** (0.0403)
ln <i>capital</i>	0.1269*** (0.0260)	0.1337*** (0.0252)	0.1074*** (0.0186)
ln <i>information</i>	-0.0267* (0.0161)	-0.0250 (0.0155)	0.0620** (0.0263)
<i>urban</i>	2.3559*** (0.2870)	2.0694*** (0.2927)	1.1713*** (0.2600)
ln <i>finance</i>	0.2615*** (0.0392)	0.2069*** (0.0413)	-0.0404 (0.0337)
<i>market</i>	-0.0159 (0.0105)	-0.0236** (0.0104)	0.0048 (0.0100)
λ	0.3750*** (0.0753)	0.3731*** (0.0719)	0.5028*** (0.0555)
Sigma^2	0.0104*** (0.0007)	0.0101*** (0.0007)	0.0059*** (0.0004)
<i>N</i>	420	420	420
<i>R</i> ²	0.7930	0.8007	0.5887

五、结论与启示

(一) 主要结论

和谐消费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消费力和和谐与消费关系和谐分别是共同富裕中“效率与公平”思想对和谐消费的具体要求。本文基于共同富裕视角进一步厘清和谐消费的理论内涵,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地测算 2007—2020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和谐消费水平, 明确中国和谐消费

的动态演变过程与典型特征, 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和谐消费的经济增长空间效应, 得到以下结论:

(1) 从时间趋势来看, 2007—2020 年中国和谐消费水平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但整体而言, 中国消费力与消费关系仍处于初级协调层次, 消费和谐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空间分布来看, 中国和谐消费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异格局。综合来看, 中国和谐消费具有经济依赖性、地理区位性和鲜明演进性等典型特征。

(2) 和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并且在剔除异常值、增加控制变量与更换空间权重矩阵等稳健性检验后, 结论依然成立。

(3) 和谐消费不仅能够通过需求效应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还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牵引高质量供给, 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供需联动机制。

(二) 政策启示

为提升中国和谐消费水平, 释放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价值, 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以居民收入提高与社会保障完善为主线, 促进消费力和谐。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核心因素, 提升消费力关键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为此, 一方面要逐步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直补”政策力度, 改善农业结构, 发展优质高效农业, 促进农民增收; 另一方面也要鼓励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 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 提高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 居民消费不仅与当前收入有关, 也与未来预期有关, 因此, 为使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 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稳步推进医疗、住房、教育体制改革, 降低居民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

(2) 以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与社会信用体制健全为抓手, 改善消费关系。消费关系失谐突出表现为消费的不公平性。为培养和谐消费关系, 应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 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增强消费的公平性。此外, 畅通的消费渠道与可控的外部环境也是影响消费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 改善消费关系应不断深化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体制,构筑公平、有序、诚信的消费环境。

(3)协同推进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以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与产业的良性互动能够形成供需匹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推进需求侧管理、促进消费和谐的同时,也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实现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供需良性循环,以和谐消费为引擎,从供需两侧协同推进中国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 [1] 张占斌,毕照卿.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进路、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5):31-44.
- [2] 文启湘,冉净斐.消费和谐论:面向科学发展观的消费理论[J].经济学家,2005(2):26-32.
- [3] 龙翠红,陈赤平.消费理念的重构与和谐消费观的树立[J].消费经济,2006,22(5):58-61.
- [4] 汤跃跃.和谐消费: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新视角[J].消费经济,2007,23(2):23-24.
- [5] 马伯钧.消费和谐释义[J].消费经济,2007,23(2):25-27.
- [6] 李松龄,何文举.市场、所有制与消费和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1):39-44.
- [7] 李松龄,田辉.和谐消费的影响因素与制度安排[J].求索,2008(10):43-45.
- [8] 李松龄.关于消费和谐的几个理论问题[J].消费经济,2009,25(1):82-84.
- [9]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56(11):4-13.
- [10] 张占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理论与路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6):52-60.
- [11] 徐政,郑霖豪.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4):39-52.
- [12]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8):117-129.
- [13] 龙云安,孔德源,黄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对策研究:基于能源结构、金融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层面的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23,41(1):80-89.
- [14] 徐瑾,陈慧琳,钱明明.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J].经济问题探索,2023(3):143-158.
- [15] 徐维祥,李露,周建平,等.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9):2044-2062.
- [16] 王成,唐宁.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J].地理研究,2018,37(6):1100-1114.
- [17] 生延超,钟志平.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旅游学刊,2009,24(8):23-29.
- [18] 方达,张广辉.环境污染、人口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6):3-12,158.
- [19] 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11):3-20.
- [20]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16.
- [22] 罗盛锋,王雅文,黄燕玲,等.耦合协调视角下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研究:以桂林11县为例[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8(2):42-50.
- [23] 杨慧梅,江璐.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J].统计研究,2021,38(4):3-15.
- [24] 钱海章,陶云清,曹松威,等.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6):26-46.
- [25] 何冬梅,刘鹏.人口老龄化、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1):3-20.
- [26] 蔡海亚,徐盈之.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10):3-22.
- [27] 梁雯,叶仁慧,顾大超.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物流业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6(6):11-20.
- [28] 于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5):4-16,31.

责任编辑:徐海燕